

目 录

抗日战争回忆录.....	张发奎 (1)
一、淞沪会战.....	(2)
二、武汉会战.....	(19)
三、南岳军事会议.....	(35)
四、敌人钦州登陆.....	(48)
五、对广州附近之敌采取机动攻势.....	(49)
六、桂南战役.....	(51)
七、调整部署.....	(53)
八、桂柳会战.....	(58)
九、广州进军受降.....	(71)
 抗战时期四、七战区交替始末	李清之 (84)
第三次粤北会战和赣南战役	丘 寔 (98)
略忆独九旅在惠州抗日	白 韦 (127)
我参加“八·一三”淞沪抗战的一点回忆.....	何宝松 (132)
 香港沦陷前后港穗澳见闻杂记	陈 谦 (139)
抗战期间惠州四次沦陷回忆	梁海南 (161)
广州弃守前后沙面孤岛要事日记	

(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八日——

十月二十九日) H.S 史密斯著 (168)
黄增章译

日寇在南粤的暴行 夏豚琼 徐启华 (189)

附录: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驻粤部队番号及各级长

官姓名表 (203)

第四路军指挥系统表

第四战区在粤部队指挥系统表

第四战区战斗序列表

第七战区指挥系统表(一)

第七战区指挥系统表(二)

抗日战争回忆录

张发奎

编者按：张发奎（一八九六——一九八〇年），字向华，广东始兴人。他早年投身于粤军，当过大本营警卫团的营长。在革命政府统一两广革命根据地斗争中，他参加过多次战役，因功由团长升为旅长、师长。一九二六年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张发奎率十二师参加了汀泗桥、贺胜桥、围攻武昌和德安马回岭诸役，为第四军获得“铁军”称誉立下汗马功劳，张本人亦升任第四军军长、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大革命失败后，张发奎多次参与反蒋活动。抗日战争爆发后，张发奎出任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参加淞沪会战，其后改任第二兵团总司令、第四战区司令长官、第二方面军司令官等职，参加过武汉外围保卫战、桂南会战、桂柳会战等重大战役。日本投降后，张发奎担任广州地区受降官、广州行营主任，负责广州地区受降接收事宜。解放战争期间，张发奎担任过国民党广州行辕主任兼广东绥靖公署主任、陆军总司令等职。一九四九年七月，张发奎出走香港，后寓居于香港，于一九八〇年三月逝世。

张发奎的这份回忆录，是他生前口述，由其秘书黄宗潮整理而成，原载于台北《广东文献》杂志一九八三年第一至四期。回忆录较为翔实、具体地记述了张发奎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主要活动，是研究抗日战争史和张发奎本人历史的珍贵资料。根据第五次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工作会议精神，适当介绍一些港、台史学著作，从文史资料角度加强内地与港、台的联系，对于促进文化交流，进而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有着积极意义。为此，我们特将张发奎的这份回忆录介绍给国内读者。但由于原文篇幅过长，这里只选录其中一部分，文中所标章节依次为原文的第一至第七节，第九节和第十四节。

一、淞沪会战

(1) 战前受命与备战

我在民国二十一年冬奉派以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的名义，赴欧美各地考察军事，作为建军之参考，先到欧洲之英、法、德等国，目睹列强三军的装备与军事教育技能，均随科学之发展而改良，突飞猛进，尤以德国之特种部队——如伞兵及装甲部队等之训练，与民族精神士气之激昂，深为感动。民二十三年冬转赴美国，又考察了八个月，见闻益深，耳目为之一新，真是胜过读万卷书。依我考察所得，过去之平面战争，已进步到立体战争，无空防即无国防，我当时即有留美加学空军之意，惜体格检验不合未果。其时，适蒋先生电召回国，乃结束为时三年之欧美考察生活，民二十四年秋返抵国内，转赴四川成都，晋见正在该方坐镇“剿匪”（原文如此，引号为编者所加）之蒋先生，当其征询意见时，我即表示以希望为未来抗战之军职尽力。民二十五年一月被派闽、浙、赣、皖四省边区总指挥职，力辞未获。同年冬转调苏、浙边区主任，其任务乃兼负构筑国防工事，不消说，这是我国整个对日作战计划中主要准备工作的一部分，它对日后的抗战，至关重要，所以我欣然接受了。

苏浙边区主任的驻地在浙江省嘉兴县，主要任务为构筑苏、浙边境自乍浦——嘉善——西塘镇之线的国防工事，以杭州湾及太湖为左右两翼依托，并与左翼之苏州（吴县）福山国防工事相连系。这是对日抗战前我国国防设施计划之一部，也是为未来淞沪作战而设备的。我当时异常重视这项工作，曾不辞劳苦的缜密计划，经常分赴现地监督施工，恰好在“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前

夕赶筑完成，但最可惜的是在淞沪会战前后，因兵力部署与作战计划及战术思想不一致，再加上军政两方面的不协调，结果，这些国防工事未能充分运用，发挥它的作用和价值。

民国二十六年间，日本军阀悍然侵华。敌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爱师本庄繁“九一八”之故技，纵其丰台驻军，于二十六年七月七日深夜，在芦沟桥附近非法演习，制造衅端，向我该地驻军第二十九军之第二一九团包围攻击，遂掀起中日全面战争之巨祸。

我于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在紧急的命令之下，回到了嘉兴，并接受了应预期于淞沪作战之积极准备意旨。在这种情况下与任务之下，我必须考虑指导下述二种行动：第一，我如何去运用辖区人民的热烈情绪与不规律的意气行动，使其导入于有计划的发展与有秩序而镇静行为。因战争是不得已之艰巨任务，国民是战力的源泉，军队对敌的作战能力，胥视人民的知识与民族精神而定，人民不但须有强烈的战斗意志，而其在战时的生活，必须适合于战时的条件，正如蒋百里先生所云：“生活与战争条件一致者强，相离者弱，相反者亡”的名言。第二，我必须预先搜集战争必要资料，判断将来状况的推移，和缜密部署军队与其他一切的战斗准备及各种措施，俾使在任何紧急情况之下获得主动作战的地位与自由。这是一种不易下达的决心，因为须有先知的谋算和特别的慧眼来做这个计划的基础。

八月上旬，我奉到立即从事上海作战右翼部署的命令，计划把辖下的部队利用夜间秘密推进于上海的边缘，以攻势行动，先歼灭上海驻留的日军，俾收得先制之利，并使敌人海上增援的部队，无法取得立足之地位。因攻击才能行动自由而立于主动的地位，而奇袭乃战术上最卓越的行动，胜利之冠，亦只有辉煌在攻击者的头上，故我始终反对消极作战的手段。犹忆民国二十一年

“一二八”之役的第一晚上，前十九路军蒋光鼐邀我和黄琪翔一同至虹桥商讨作战计划时，他告诉我在上海驻留的日军约三千人，我军于今晚可得使用的兵力约为两个团以上的状况之后，我就曾对他说：“应不顾一切，采取迅速而彻底的攻击，以车辆送部队，突击虹口之日军司令部，并以商轮堵塞吴淞口，遮断其水陆之交通，只有这样才可以歼灭上海的敌人，并引导于我有利的战斗。如顾虑国际与外交，是战略政略上的最大错误。”但他终以“只有应战，不能求战”的见解，否定我的建议，而遭受失败的命运，那是对日战争采取消极抵抗的痛苦教训。

这次我把辖区原属我指挥仅有两个师秘密地向上海附近推进，以李松山（第五十五师）进出浦东及右侧的沿海地带，阮肇昌（第五十七师）进出于上海龙华附近，我自己带了必要的幕僚在南桥设立指挥所，如果作战的重点在左翼方面，阮师可随时转用于该方面作战。我当时非常兴奋，并愉快的憧憬着辉煌战果的来临。我觉得这个任务是十分艰巨，虽然所指挥的部队，不能如已往自己建立亲自督训的前第四军的子弟兵一样的亲切而深刻了解，当此国家民族危难的时候，捍卫国家，乃军人应尽之天职，怯懦推诿，决不是一个忠勇的军人，故应以坚苦卓绝的精神，竭尽一己之智能来克服一切困难。旬日以来，我以非常紧张的情绪，静候着战鼓的擂动。

（2）淞沪会战（参照附表一）

八月九日，敌人的兵舰集中于黄浦江和长江口的江面，其陆战队万余人在上海登陆，并以武装士兵闯入我虹桥机场滋事为藉口，要求我撤退驻沪之保安团队，经我方严词拒绝后，遂于十三日正式揭开了淞沪会战的序幕。

最高统帅部适时下达了淞沪方面军队的战斗序列：张治中担

任左翼军总司令，我担任右翼军总司令；并以李松山、阮肇昌、刘尚志各师及张奎基的独立旅，炮兵第二旅第二团编为第十八集团军（应为第八集团军——编者），该集团军之总司令亦由我兼任；同时刘建绪之第十集团军亦归入本右翼军之序列。我即令张旅推进浦东接替李松山师的防务，李师移动到上海方面，俾得适时策应左翼军之作战，并以刘尚志师推进至松江附近，控置为集团军之总预备队，刘建绪部则由衢州向杭州推进，作为右翼军的第二线兵团。

八月十三日敌我在上海的部队发生接触。我左翼军照原定计划开始攻击，经数日的战斗，因我军没有摧破坚固工事的兵器，且不熟练街市战，虽一度进出汇山码头，但敌人的整个防线，终未能攻破。当时我右翼军方面，因为在南市方面，隔着一个租界，暂作缓冲地带，在浦东方面，亦因受黄浦江之地障关系，敌我均非主作战重点，战况较为沉寂；但左翼军方面战况吃紧，我必须用各种方法去策应支援该方之作战，除将阮师增加左翼军方面外，我并以炮兵在浦东之洋泾附近设置炮兵阵地袭击敌人之左侧背，收效甚大。

“神炮”——浦东炮兵对敌人的袭击，在这次会战中是最值得回忆的一件事。这是一种运用炮兵奇袭的特别方法，当时曾被敌人誉为“神炮”，曾打击了敌人的“出云旗舰”，也袭击了虹口的日军司令部，发挥最大的威力，敌人感受了重大的威胁和伤亡，敌方曾费了很多的侦察手段，企图毁灭该炮兵，但终未得逞。盖我炮兵阵地位置在浦东之洋泾附近正对着虹口的日军司令部，可以瞰制黄浦江面上的敌舰及其后方部队的行动，并利用海底电线在对岸设置有一个秘密而良好的观测所，来指挥我炮兵之射击和修正弹着之偏差，虽在夜间亦能准确射击。且为避免日本空军之威

胁，常利用夜暗作活动时间，白昼则巧妙的把它伪装起来，藏匿于低洼沟渠或竹林深处。亘会战的全过程，“神炮”的阵地位置始终未为敌人发现，我非常的爱护它，常亲自去指挥它，在会战終了最困难的时期，我亦尽各种手段，把它安全的转移于另一次战役。

“神炮”还有一个更可回忆的故事：有一天，上海的几个新闻记者来战地采访新闻，对“神炮”特别羡慕，要求去看它的雄姿时，在竹林隐蔽的炮兵阵地里，炮兵营长和他们摄了一张照片，次晨他们把采访战地新闻，披露于报上，同时把这一张照片刊登出来。当我在时事新闻上，发现了这段消息后，我立即认为这件军事消息的泄露，对于“神炮”之安全，将有莫大的危险，我立即命令该营迅速变换阵地。是日中午，果不出我所料，一队敌机，把所有洋泾附近的竹林全部炸毁，其附近的居民也遭受了鱼池之殃，损失不少，但“神炮”因能及时变换阵地，而依然无恙。事后炮兵营长撤了职，报馆受了查究，记者亦被扣办。这件事的发生，对于新闻报导得了很好的教训，而一个指挥官对于细末小节亦应时刻留意，不能疏忽。那时我只仅有这六门的“卜福斯”山炮，假如有较多的炮量和较大口径的炮种，相信对本会战中得更多的帮助。我曾建议统帅部，由乍浦附近海岸建筑一条可以运动重炮兵的临时道路直达浦东，效法海岸游动炮兵的运用，调派一部重炮兵使用于浦东方面，惜因炮兵过于缺乏，而未能采纳。

八月二十二日敌增加第三师团、第十一师团及第一师团、第八师团之各一旅团，同时在宝山、狮子林登陆，向我左翼军方面之宝山、罗店、浏河之线进攻，我右翼方面之川沙及浦东各地，敌人亦分别作积极之蠢动。我军亦同样以京沪、沪杭两铁道输送后续部队，投入于左翼军方面。双方均以强大的兵力作阵地战之

搏斗，战况异常激烈，使我们原来预期以攻势作战手段指导会战的计划顿挫，被迫变为一种纯粹的防御阵地战了。

我军最高统帅部在后方尽量的挹注兵力于淞沪方面，企图确保这个远东最大的都市。京沪、沪杭两铁路日夜不间断的奔驰，一师一师的部队逐次加入填补防线，其情况好像一九一六年法军为挽救凡尔登要塞的危机，从巴黎运送增援部队的状况相似。敌人方面新装备和战术技能，已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其多量的野战炮兵配合着海军的长射炮的盛炽火力，已在战场上获得优势主动的地位。我军则在战壕里，而且只有临时构筑之野战工事，以劣势之装备，凭着血肉之躯与敌搏斗，其牺牲之大，是可以想像得到的。我常殚精竭虑的作状况之推移判断：倘我军以大量的兵力投入该方面的决战防御，仍无胜算把握时，则我们的纯粹的防御计划，应否加以修正？实有考虑之必要。目前已经过了两周的激烈战斗，欲将敌人歼灭或遏止其攻势，在我军之现有条件之下，恐难以达成。因此，我和张治中曾建议最高统帅部，对上海会战可能适时运用兵力之最高点，作有效而精密的计算，若超过这个限度仍不能挽回战局以制压敌人时，则我们的战略，似应转变为持久消耗战，并先以约十个师兵力预行占领苏、嘉、吴、福之既设国防工事，作为第二抵抗线，此十个师之兵力，除非用在扩张战果方面，不得为其他状况转用，我二人并愿意负责自接受敌人攻击起，固守此既设阵地三个月时间的责任。

最高统帅部否定了这个建议。他的意见以为上海是军事必争之地，应不惜一切来确保这个地区。当时敌人的后续部队尚未全部到达，战况较为沉寂，因而有些将领乃为此而受眩惑，满以为敌人攻势顿挫，冯玉祥当时亦有“淞沪方面的战事已经稳定了”的报导。

九月中旬以后，敌人增援部队——第一、第三、第六、第八、第十一、第十六、第一〇二、第一〇六、第一〇七、第一一四、第一一六等十一个师团番号已陆续发现，估计当时敌人的兵力总计约在二十余万人，炮三百余门，战车二百余辆，飞机二百余架。敌人在淞沪与我决战之企图，益加明显了。我左翼军方面，当时亦划分为二个区，以薛岳将军担任左翼，朱绍良将军担任中央，与我右翼军相连系。左翼军方面，自九月中旬以来，战况渐趋不利，阵地次第失陷，虽赖我后续部队逐次加入战斗，亦只能维持“寸土必争”之状况而已。其被突破之点，虽经逆袭，亦不能恢复。全线均处在被动挨打地位，别无进展，于整个战局无补。

我右翼方面的战况，敌虽迭次企图排除我浦东对其侧背之威胁，在我严密的戒备下，敌人几十次的登陆行动，都无法得逞。不过我常顾虑，敌人如在左翼军正面突破企图不能达成时，可能来个侧面迂回行动，因此我右侧背的金山方面是一个最可注意之地区。当时我有一个预感，回忆历史上戚继光于闽浙荡寇时代，日人曾在金山登陆而扰乱我浙境记载，如果敌人以往历史作为后事之师，则敌人从金山方面附近登陆之历史重演可能性甚大。况金山有四十呎以上的水位深度，并有利于登陆运动之沙滩，可作为滩头阵地的据点，从战术上观点来判断，那里确为一个理想登陆地点。为了这个侧背的顾虑，我曾亲自实地侦察那里的地形，在该地配置一营步兵和一连炮兵，构筑强固工事，并再三叮嘱他们固守，对海面尤须特别警戒，且令他们编组了一队渔船，远出海面从事广正面的搜索及规定海面与陆上部队之连络信号。其附近之沿海地带，我常亲自或令幕僚人员巡逻，并把沿海和浦东全线的防御地带严密组织起来。因右翼地区辽阔，兵力有限，我必须以谨慎勤劳的精神去克服，以保持我全军右侧背之安全。

整个十月期间之主作战，敌我均保持在左翼军方面。该月下旬，敌人即以全力猛烈攻击，决战的时期迫在眉睫，战地悲惨的景况，一幕一幕地呈现在我的眼前。我们的增援部队陆续向前挹注，由后方输送到达战地，没有一刻的停留和准备，就填入了火线。敌人的炮弹如雨点一样散布在我方阵地上，我劣势之炮兵，且因制空权掌握在敌方，无法与之抗衡，只有英勇之战士们用血肉来筑成长城来抵抗敌之优势火力。敌机一天到晚飞翔在我阵地上空投弹，没有立体作战经验的部队，又未讲求疏散与伪装，致招致许多无谓的伤亡。我军行动以及军事部署或调整，白昼均受限制，在暗夜实施，时间、精神方面都蒙受莫大的影响。同时战地一片平野，其不能徒涉之河流，纵横交错，通讯联络倍感困难。各级指挥官对指挥一个防御组织不健全的大兵团作战，确是一件不简单的事，这时候各级干部士兵才认识现代战争中科学的地位重要。

在这时战况高度紧张中，最可歌可泣而又值得安慰的事，是人民对我军的协助，他们不仅帮助军队的运输和救护工作，并自动献给他们仅有的食品。妇女们自动看护我们的伤兵，慰劳队的歌声，鼓舞了我们的士气，工作队的崇高热情，减少了战士们的疲劳。大军作战最感困难的后勤业务，大部都由他们帮助解决，军队为国家而流血，人民为救国家民族的忠勇军人而流汗出钱，这是民族战争的特质，也是中华民族的光荣。

十月三十日，左翼军方面的战况已到了极度的不利情势，其突击我大场阵地的敌军，已在周家宅、姚家宅两处强渡苏州河。上海市区的我军，已感受侧背的重大威胁，敌人似有从大场以西向我左右两翼席卷的趋势。朱绍良将军这时更调任甘肃省主席，所遗中央地区指挥任务，最高统帅部命令我接任，将原来我右翼

方面指挥责任交由第十集团总司令刘建绪接任。其时刘集团的部队，正从杭州向前方推进。我一面担心右翼沿海地带的侧背和刘集团部队能否确实接防，一面感于上海方面的战况，将如何去挽救这时危殆的局面，我心灵上的焦虑，是我生命史上最难忘的回忆。

十一月二日，我的指挥所由南桥移到龙华西侧的北干山，是极接近火线的位置。当我到达这里的时候，情况又变化了，第一线的部队已陷入混乱状态，其渡河的敌人，给我们侧背的威胁，益形扩大。我已没有可以抽调的预备部队来应战，而后续的兵团则迟迟未能到达，我除竭力而镇静的鼓励士气以期稳定其局面外，别无他途了。

十一月五日，一件数月来日夜焦虑的事情，不幸而言中了。敌人以其第六、第八两个师团于金山咀、全公亭等地同时强行登陆，我薄弱的守军未几即被击破。而刘集团行动迟缓，未能适时对敌人夹击，让敌长驱直向松江前进。我吴克仁军集结未毕，仓卒应战，又遭敌各个击破，九日松江遂沦陷，我军腹背受敌，其不利之态势已暴露无遗了。

从整个淞沪会战的战略上着眼，自敌人强渡苏州河后，权衡当时的双方战况，我军适时退却，是不可迟疑的事。当战事正酣，纷至沓来之各方不同的战况和敌情，如不能当机立断，适时适切下达决心，则影响以后作战甚大。指挥大军作战的指挥官所最感困难之条件也就在此。前线总指挥陈诚将军来到了我的司令部亦有同感。但最高统帅部仍犹豫未决，等到情况到了危急境地之际，于九日始下达退却命令，时机已不适切了。而且通讯联络不确实，当我奉到撤退命令时，前线部队已先我奉到，开始撤退经过我的司令部时我才发见，故有极度混乱而难于掌握之情形，狼

犹不堪之悲剧一幕一幕地出现，伤心惨目之事，回忆起来，犹有余悸。

在远东的战史中，是日俄战争后最大的战役，也是抗日战争中第一次最大的屠杀，作战时间将近三个月之久，双方动员兵力百万以上，一切当代的兵器，都已搬上战场。我们在此役中虽然损失了巨量的兵员，遭受了严重的失败，其稍堪告慰的，我们则由此而认识了现代战争的特质，获得了许多的经验与教训，增进了不少的各种战斗技能，同时惊醒国人救亡图存的观念，再接再厉，产生新、厚的丰硕力量，坚持抗战到底的决心，去争取最后胜利。

（3）苏浙战线之转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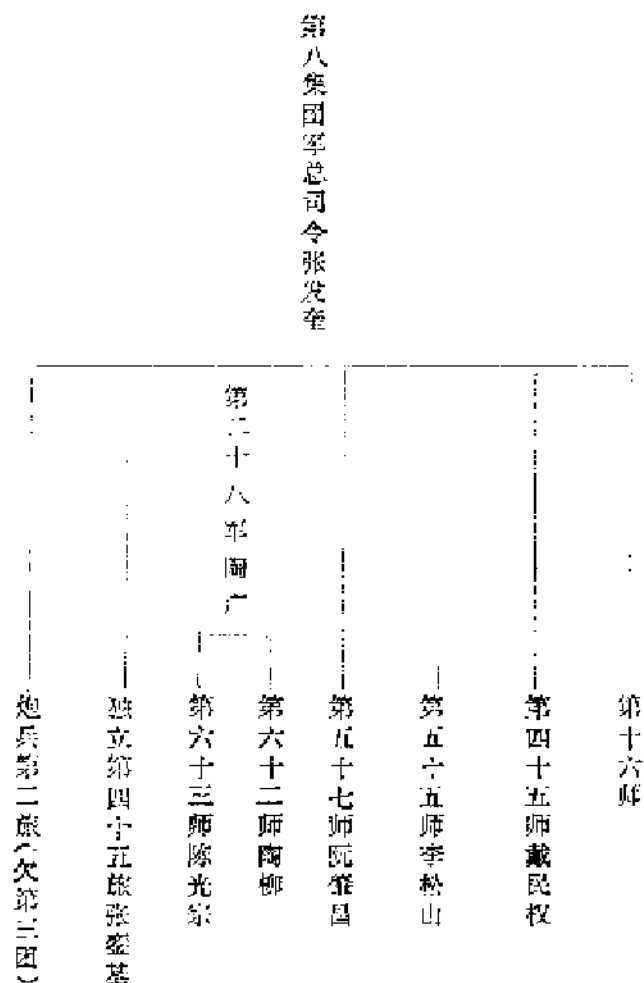
最高统帅部对淞沪会战后失败之退却命令，是于十一月八日未按正常指挥系统下达的，这是一种计划不周全而又不适切的退却。退却在战术上不是一个绝对失败的名词，在战史许多战例中，有计划战略退却，仍可转败为胜。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马肯生将军于华沙的退却指导，法军于马恩河以第六军侧击德军的右翼，都是转败为胜的退却战例，关键在于高级指挥官，对于战略与战术的能否巧妙运用而已。

九日夜，一个黯淡而悲惨的黑夜，天空闪烁着稀疏的星光，没有月亮，紧密的枪声渐渐向我的司令部接近，后方人员呈露出特别仓忙的神色，附近的居民扶老携幼向西北方向逃避，人声像闹市一样的鼎沸，天空虽时有敌机轧轧的声音，但禁止不了四周照耀黑夜逃亡的火光。这一切均充分显露出极度的紧张的情况，我怀着万分焦虑的心情，注视着事态的变化。

记得民国二十六年十一月九日我军自前线开始撤退时，一件使我吃惊的事件曾经发生。那时我身任淞沪会战之中央军地区指

附表一：

淞沪会战杭州湾北岸及浦东之防御指挥系统表（民国二十六年八月十三日至九月十日）



挥官，竟不知道前线部队已奉命撤退。当时俞济时将军经过我的司令部门前时，恰好为我发现，俞当时属胡宗南将军指挥，而胡则属我指挥的，当时我问他到何处？他才报告我说：“已奉命撤退，难道总司令不知吗？”事实上当时我确未接到撤退命令，其书面命令，乃后来经由第九集团军胡宗南将军转来的，他并且已先拆阅过。故我接到此命令前，上级并无任何预先指示。但是我辖下的各部队因先知上级的企图，未等到我的指示就先行开始撤

退。这种传达命令的方式和下达时间计算之错误，可以想像上级人员如何的慌乱。尤令我不解的，退却命令所选定之青浦、白鹤港之线，距现阵地仅约五十公里，试问这短少五十公里距离，如何可以作为百万大军之退却目标？但我仍基于上级的指示而下达三个集团的退却命令，以完成我的手续，而我命令中的各种规定，恐没有办法实施，因为各部队已早于我的命令下达之前而自动开始退却了。

当敌骑接近了北干山边缘的时候，我们的部队大部虽撤离，但仍有少数的落伍士兵和伤患，呻吟于沿途两侧。我怀着万分悲痛的心情向青浦转进，途中我看见了一些毫无规律而极度混乱的退却现象——各行进的交叉，方向的错误，军民的混杂，友军误会的冲突，指挥官不能掌握部下，部队寻觅不到自己部队长的位置种种的坏现象，都已暴露无遗。在此生死紧急关头中，部队之是否精练，将领以及各级指挥官之素养与责任心如何？是一个现实最好的考验。

敌之追击部队，紧蹙在我们的部队之后，到达青浦时不但未能妥善部署，且没有喘息的余裕时间，青浦又于十一日失陷。那时松江已沦敌手，我虽奉令解除中央军地区总司令的职责，回复右翼军的指挥任务，但已不能从沪杭路线归队，因须绕道，不能及时到达，只有电令第十集团军迅速确实占领乍浦、嘉善之线既设阵地拒止敌人。

乍浦、嘉善之阵地，是战前我亲自监督完成的，这一带地形，我特别的熟悉，希望在此线以最大的努力来迟滞敌人由沪杭线南下，遂决心亲赴嘉善督师。幕僚们为我个人的安全而担忧，加以劝阻，我未予采纳。我于十三日到了嘉善，当我在弹雨之下视察阵地时，得知保存工事图表之人员，与掌握掩体钥匙的乡保

甲长均已逃避了，部队无法进入既设工事。而且当时仅有一师装备腐败的兵力，占领了约三十公里之正面，在暴露的土堆上构筑临时野战掩体，与当面第十六师团和近卫旅团之一部优势装备之敌抗衡。在这不利的状况下，十四日失了嘉善，十九日嘉兴沦陷，敌人的铁蹄即踏入杭州门户。

左翼京沪线，亦陷于同样的命运。部队退却更为混乱，没有一个部队作过有组织的抵抗，亦没有一个部队稳定的占领过阵地拒止敌人，吴县、福山、锡澄两线的既设阵地均无兵力加以利用，任令敌人毫无阻碍而从容的跨进了这两道南京的门户。这时我再忆起我前面所述的建议未被采纳之失策，否则我们不仅可以迟滞敌人向南京进犯的时间，而从淞沪撤退的大军，亦决不致蒙受如此狼狈的地步。

十一月下旬，敌以主力沿京杭公路，一部沿京沪铁路以钳形的战略攻势向南京前进。南京是我们的首都，其得失对于国际与国内的影响，较上海的关系更为重大。最高统帅部最初原有意保卫南京，但作战如奕棋一样，满盘之差，错落一子，即不可收拾。我们在淞沪会战既已损失了精锐部队的主力，其由该方面转进的兵团，数量上虽不少，但大都残破不堪，战力薄弱，非有相当人马及装备时间整补，一时难以复元。况当时我军态势上又处于内线作战被动地位，欲在南京外围各个击破由京杭、京沪两路齐头并进的敌人，依现有兵力及态势来看，其不可能公算甚大。因此我们必须从坚守据点着眼，指导南京的战斗，故对于时间、兵员、弹药、给养以及外援兵团的运用，转移攻势时日的策定，均应从速准备和详密的谋算。

无疑的，保卫南京，乃一个重要的决策，最高统帅部召集我们在南京开了一个会议，结果，唐生智自告奋勇，肩起了保卫大

南京的责任。我被改派在宜兴方面指挥刚从广西调来的廖磊兵团，在该地附近，占领一个侧面阵地，以策应南京的保卫战。杭州方面的指挥责任则交由刘建绪接替。当我到达宜兴的时候，广德与常州已发现敌人，江阴要塞亦失陷了。

敌之行动是迅速的。由京杭路前进之敌，在吴兴及在安吉、泗安方面分别击破了廖磊及刘湘军后，十二月四日已进出于句容及秣陵关附近。由于外围我军兵力的脆弱及南京防御组织不健全，战斗仅一周的短暂时间，我中华民国之首都即被异族——日寇占领了。

南京于十二月十二日沦陷，太阳旗十三日晨竖上南京的城楼，这是一个最悲痛的记忆，也是我中华民族最大的耻辱。不过南京的失陷，在淞沪会战失败后，早为一般人意料所及，在军事立场上说，南京的保卫战，不能成为一次会战，仅可认为淞沪会战的尾声，亦可认为是敌人追击目标的最后一次战斗而已。

南京失陷后所带来的灾难，其悲惨情形，我真不忍卒述。居留南京之未及逃离的千万民众，被日本军阀屠杀。其保卫南京的战士，抱着保存中华民族坚忍不拔的伟大精神，虽在敌人包围之下，亦不愿屈膝投降，仍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苦斗，实施突围，或只身横渡、泗水长江而归队，在突围与渡江中，千万的战士壮烈牺牲了。京、沪一带的民众，为着不愿作敌人的奴隶，扶老携幼，成群结队跋山涉水，向后无目的的流浪逃避，只知保存忠义气节，至于流浪到何地？与将来的生活如何？都不加以考虑。我从宜兴向于潜转进途中，到达于潜附近，遇见一个松江县的土人，他带着妻子和几个孩子，肩挑着一担行李，跟着我们向于潜方向行进。他对我说：“我是松江人，十一月九日，鬼子进了松江城，我就逃出过着流浪的生活了。”我问他为什么逃离家乡？现在